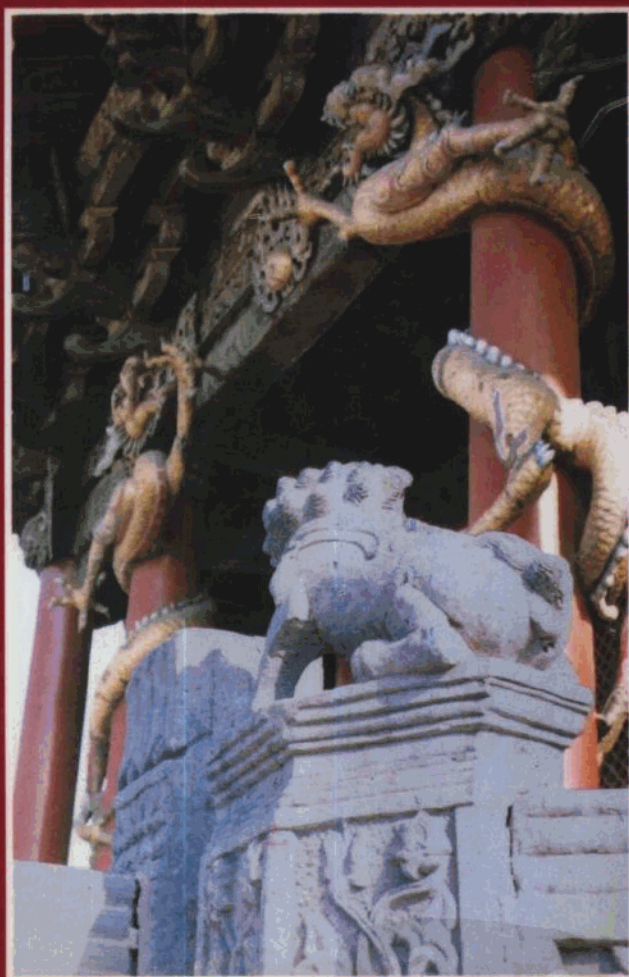


清前历史文化

支运亭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清前历史文化

——清前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

支运亭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前历史文化: 清前期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支运亭主编.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7.11

ISBN 7-5610-3515-2

I. 清… II. 支… III. 历史-中国-清前期-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K249.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97) 第26821号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1998年1月第1版 1998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31.5 插页: 3

字数: 800千字 印数: 1-500册

责任编辑: 闻璐常江 封面设计: 刘桂湘

责任校对: 齐月 版式设计: 吴明

ISBN 7-5610-3515-2

K·312 定价: 88.00元

序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庆七十周年纪念，举行清前期文化的学术讨论会，我来这里谈一点粗浅的感想。

讨论题目出得很好，涵盖面非常宽广。讨论清前期文化很有意义，可以从多方面阐述这个问题。清前期文化既有明清之际学术思想，黄宗羲、顾炎武一直到阎百诗、胡舄明……都是清初思想家。又可以从中西文化交流，从汤若望、南怀仁这些传教士所进行的文化、科学技术的交流来研讨，也可以从满族的崛起，他们的语言文化习俗各方面来研讨，我看这次会的议论文这方面比较多，入关前后的满族文化、语言文字、建筑、服饰、宗教等等。我觉得这是我们清史研究中的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民族文化中很重要的问题，有深入探讨的必要。我也就这个问题发表粗浅的看法。

满族作为一个新兴的民族共同体在17世纪兴起，具有自己的语言，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有自己的风俗习惯，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他的文化继承了女真文化，吸收了其它各族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特点。满族文化类型基本属于游猎民族文论，跟中原地区汉族的农耕文化不一样，骑马射箭、能歌善舞，信仰萨满教，有他一套风俗习惯、神话传说和自己的语言。研究清前期文化，可以看出满族文化和其它民族文化如何接触、交流、融合、吸收，探讨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在交流融合中带规律性的东西。这是很有意义的。满族的文化有很大的特点，即是他的开放性、包容性。他不排斥其他先进民族文化，最善于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长处，例如他的语言文字，满文和蒙文很接近，是从蒙文变化而来。同时又大量吸收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有很大的包容性，不像基督教，对异族文化，对所冒异教徒是深恶痛绝的，排斥得很厉害，满族文化不是这样。满族能够迅速发展壮大和其文化特点是有关联的。他能够吸收先进文化，这在满族前期看得很清楚，无论是努尔哈赤、皇太极，还是康熙，都在努力吸收文化发展文化。在经济上、军事上、政治上模仿汉族，无论生产方式，

还是政治军事、典章制度以及价值取向，吸收汉族的很多东西。我们说“清承明制”，基本上承继了明朝。在中国历史外，少数兄弟民族吸收汉文化，以满族接受的最快，我想这可能是满族能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而且这个政权坚持268年之久的重要原因，文化上的融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如果文化上不能吸收先进的、其他民族的文化，那么民族矛盾就不能消除或缓和，他以后的统治就会很困难。我们看元朝就是这个样子。我想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满族在这方面很成功，这对中华民族也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而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现实也有重大的意义。满汉文化迅速交流融合，对形成中国今天的现状有重大的关系。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少数民族，像匈奴、鲜卑、突厥、回鹘、契丹、女真，曾经在中国历史上叱咤风云，影响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但这些民族都哪里去了？现在都消失了，没有了。其实是经过民族的融合，失去了民族的特性，失去了民族的文化。古代各民族名称的消失，并不是种族的消灭，他并没有消灭，他与汉族融合在一起，没有了本民族文化的特色。古代的民族在个体上并没有消灭而是与汉族融合在一起。今天汉族人口有11亿多，其实有些并不是汉族，而是少数民族的后代，尤其是北方。从血缘上讲，有很多是混血。如果一个民族用暴力去欺压和强制同化另一个民族，这是反动的；如果民族融合是自然的，自然地渗透，自然地交流，自然地融合则是进步的。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合适？满族文化的特点就是包容性、开放性，吸收汉族文化逐渐融合。但这种文化交流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双向的，满族吸收汉族文化，汉族也吸收满族的文化，这一点也要引起充分注意。我们研究清史要看到这一点，汉族同样也吸收满族文化来丰富自己，充实自己，例如服饰上，中原的原来宽衣博带的汉家衣冠经过清朝以后，变成满族服饰，穿旗袍了。其实袍褂都是满族的。在语言上，很多满语的词汇进入了汉语，满语专家在这方面有很多研究。这次会议上沈阳故宫王爱华同志写的《满汉文化的融合与“档案”词源》提出我们现在使用“档案”二个字，即出于满族的词汇，是从满语中的“档子”演化来的。近代的北方话和古代的北方话，很不一样，古代的北方话反而保存在南方江苏、浙江、福建一带，而河南、陕西一带的语音变化和古代很不一样，因为古代很多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他们的语言进入中原，影响改变了当地的汉族语言。这种语言学上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的北京话和满族语言很有关系，说地道北京话的是旗人，他们入关后，一方面学习和使用汉语；另一方面又把满语的词音词汇带进汉语之中，这就是语言的交流融合。《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他的口语接近现在北京话，而其他古代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和现代北京话并不接近，《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是内务府正白旗包衣，生活在满族环境中，他的语言大概是满族入关以后学习汉语，把

满族的语言特点带进关内，带进汉语而产生的。这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红楼梦》的语言，恐怕不是纯粹明朝末年的北京语言，可能是满族入关以后学习北京话所形成的语言，就像广东人学普通话一样地方味的语言，所以满汉在语言上的融合并不是单纯满族学习汉语，而汉族也受了满语很大的影响。在北方，民间的艺术受很多满族的影响，比如大鼓、西河大鼓、梅花大鼓、京韵大鼓、坠子等。还有评书，是在满族的子弟影响下，吸收了民间流传的艺术，产生新的艺术品种。清代前期北京内城只准满族旗人住，汉族住在外城，因此我们可以想见当时北京内城，前门以内全是旗人和汉军旗人，其生活风尚肯定和汉族不一样。北京是首都，首善之区，会很快影响到外城，影响到全国。我想“京派”、“京味”作品很多，老舍的作品《茶馆》、《骆驼祥子》京味很足，他很多作品都写了满族的中下层的生活，保存有很多满族生满的情趣。“京派”、“京味”可能保存了很多的满族的文化艺术。“京剧”在徽班进就以前是汉族的文化，进京以后北京有很多旗人，这个剧种在这里的生活土壤上生存下来，而且后来很多满族人欣赏学习并从事于此，它的音乐、唱腔也会受满族的影响，京剧艺术家有很多满族人，京剧作为汉族艺术，而且作为传统文化重要的形成之一，满族也参加了创作、演出，共同发展了京剧艺术。

总之，清前期的文化中，满汉文化的交流是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我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丰富灿烂，文化艺术品种很多样，研究清前期文化，研究满汉文化交流融合，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传统文化。研究满族文化，我们一方面可以从满族书籍、生活里研究它；还有一个方面，我们可以从大文化范围、中华民族大文化内，看哪些是满族文化的影响。这个工作恐怕还没有做起来，从语言文字上看满族语言对汉语的影响，还有绘画艺术、书法艺术，领域很多，从各个领域去研究，满族的文化特色已经融化到中华民族中去，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的组成部分。这是满族在历史上的伟大贡献，对我们丰富多彩的中华民族文化有重大意义。以上谈些粗浅的感想，向大家请教。

前言

自张謇在1905年创立南通博物苑，开创了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先河，辛亥革命以后，国人和政府陆续开办了我国早期博物馆，如北京历史博物馆（后为中国历史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山西省图书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沈阳故宫博物院（东三省博物馆）也是其中之一。她创建于1926年11月16日，迄今已经七十初度。开创以来她曾展现过“宫阙禁地”和“清代三大官藏之一”的威严与辉煌，也曾饱受帝国主义的掠夺、破坏，蒙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羞辱和亡国之恨。由于政局动荡，兵燹交加，使得沈阳故宫博物院在解放前三起三落，屡遭破坏，步履维艰。1949年11月沈阳解放后，沈阳故宫博物院才成为劳动人民观瞻游览的场所、传播历史知识的课堂、度藏文物珍品的宝库、从事科学研究的阵地。1954年，经国家批准，确定沈阳故宫博物院的性质为清代历史、艺术性质的博物馆。1961年，国家又将沈阳故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沈阳故宫博物院乘改革开放的春风深入开展科学研究，解决了沈阳故宫一系列疑难问题，为古建维修、文物保护、展区开发和陈列展览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理论指导。进入90年代以后，沈阳故宫博物院坚持办院方向，以科研为先导，加大改革力度，狠抓陈列改造，认真对古建筑群进行抢救性和保护性维修，不断开拓外展，再造新时期博物院的新形象。几年来，院领导带领科研人员积极开展各项科研活动，不仅出版了26部计500多万字的学术专著和科普读物，而且大部分科研成果向本院古建维修、文物保护、陈列展览、博物院管理等项工作转化，使其成为本院各项工作的源泉，也使得各项工作不断获奖。全院各项工作实现了良性循环，成为国内博物馆界的佼佼者。

沈阳故宫七十年的历程，非常典型而集中地反映了我国博物馆事业艰苦曲折的发展历程，对沈阳故宫博物院七十年历史的回顾与总结，无疑是世纪之

交对20世纪我国博物馆事业产生、艰难起步、曲折发展的世纪性总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进一步弘扬历史文化,我们在辽宁省委、省政府、沈阳市委、市政府的亲切关怀和直接指导下,于1996年金秋10月在沈阳成功地召开了“纪念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大会暨清前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国内博物馆界、省内各文博单位的领导同志及清史、满学、文博界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戴逸、王鍾翰、史树青、朱家潜、刘久庵、冯其庸、蔡美彪、王俊义、阎崇年等诸先生,北京、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社科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省民族研究所、人民大学清史所、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还有来自美国、日本、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和台湾地区的专家学者共400余人参加了纪念大会,120余人参加了学术研讨会,真可谓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党和国家对沈阳故宫博物院的院庆和“清前期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亲切的关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和许多领导同志亲笔题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李铁映同志发来了贺电,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交流中心也发来了贺电表示祝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锡铭、最高人民检察院原副检察长关山复、财政部常务副部长刘积彬、文化部副部长潘震宙、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马自树、沈阳军区及驻省部队领导、省市有关领导同志和老领导都亲临大会。纪念大会和学术研讨会开得十分成功。堪称辽宁省沈阳市文化学术界难得的盛会。参加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代表们向大会提交了一百多篇论文,内容涉及清前期政治、军事、文化、历史人物、典章制度、文学艺术、语言文字、科学技术、建筑思想、宗教信仰、民族风俗民情以及文物、图书档案、中西文化交流等诸多方面,真是“高文皆正典,奇宝尽琳琅”,具有较高的整体水平。会后我们将代表们的论文结集出版,约70余万字,命名为《清前历史文化》。

清前期文化同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一样,同样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类的活动不外乎是创造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人类的历史实际上是文化的形成与变迁的过程,因而只有对文化变迁有了深刻的理解才能正确认识中国的历史,而只有正确认识历史,才能如实地表现历史,正确地认识现实,使人们从历史的经验中得到启迪。明末清初,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和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变迁的典型时期。在这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非常尖锐而又互相交织的历史时期,作为“边邑夷族”的满族为什么能迅速崛起并入主中原?他在文化层面上的特点是什么?这是治清史、满族史的学者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是作为从事清代历史、艺术研究的沈阳故宫博物院全体同志经常求索的问题。本书收编的论文是国内外史学工作者和故宫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在多年工作和实践中研

究和探索的成果的一部分。他们从清初建筑到国语骑射、宗教信仰、饮食习俗、婚姻礼节、陵寝丧葬、音乐舞蹈等民族风情风俗事象；从语言文字到文学、史学；从典章制度以及图书文献档案；从战争、人物到军事思想、思想文化；从文物的度藏、文物的思想内涵和文化价值到与周边国家及世界的文化交流；从沈阳故宫的历史沿革、管理机构到今天对沈阳故宫的研究等等诸多方面都作了精辟的论述。本次研讨会上，沈阳故宫博物院和清史界的几位同志提出的《清前期皇宫建筑风格、艺术的变化和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等五篇论文连同我院编纂出版的专著《清宫大政殿》、《中国建筑艺术全集·沈阳故宫卷》等从微观到宏观，从纵向到横向对清建筑艺术特点、体系、文化内涵、文化融合和发展趋势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与突破性进展。正如戴逸、王鍾翰、朱家溍、蔡美彪诸位先生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所指出的，满族文化继承了女真文化，吸收了其他各族的文化，具有丰富的内涵与特点，而他最大的特点是他的开放性、包容性。满族能入主中原建立全国政权，并且这个政权维持了268年之久，融合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这一点应该是一个历史的进步，满族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这对中华民族是一个重大的贡献。几位老先生从宏观上指出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使我们对清前期文化的总体特征和各历史阶段的各自特点，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溯源涵远，稽古鉴今，如果说满族文化的嬗变之路在今天有着普遍性的意义，愈来愈显示出它的启示和范例价值的话，那么，清前文化的变迁更有它的深刻启示与范例价值。因此，对清前期文化的探讨与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历史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在世纪之交，我们需要掌握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认识现实，勇敢地开拓未来，所以我们愿把这次学术会的成果与清史、满学、文博界同仁共享。

本书在编辑过程中如有缺点错误和不足之处，尚祈各位师长同好不吝指正。本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辽宁大学出版社社长李文禄先生、责任编辑常江先生及有关人士的大力协助与关照，谨此深致谢忱。

目 录

第一部分：历史文化

序	戴 逸 (1)
前 言	支运亭 (1)
再释阿其那塞思黑与满族传统文化	王鍾翰 (1)
故宫藏禁毁书录	朱家潘 (6)
围绕尚氏家族的诸史料	细谷良夫撰 王桂良译 (21)
关于乾隆《盛京赋》汉文文本和满文文本的比较	庞晓梅撰 王 丽译 (28)
清世祖福临与祖制	翁福祥 (32)
满族《三仙女故事》探微	宋承绪 (38)
无名英雄的历史贡献 ——满族史诗《西迁之歌》的研究	林佩芬 (49)
二十世纪清代学术思想史研究之回顾	王俊义 (54)
辽西争局兵略点评	阎崇年 (65)
关于汉文旧档《各项稿簿》	谢肇华 (77)
盛京内务府与陪都宫殿	佟永功 关嘉禄 (84)
儒学对满族伦理道德的影响	何溥滢 (90)
略论《燕行录》与清代戏剧文化	王政尧 (99)
论明末清初满族与汉族的文化变迁	余梓东 (107)
清初察哈尔设旗问题考略	达力扎布 (115)
清前期东北满族区域文化的几个问题	张 杰 (123)
十八世纪中国与西方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 ——英使谒见乾隆事略剖析	杜 江 (128)
清前期皇帝典学述论	刘玉文 (134)
《御制“盛京赋”》的历史价值	唐英凯 (142)

清入关前的爱新觉罗宗族	佟悦 (150)
清朝纪事诗与清宫史	姜舜源 (158)
论康雍乾对塞外的文化治理	周晓梅 (168)
清东陵文化与清史研究	李万贵 (176)
清入关前与朝鲜李朝关系的嬗变	张斌冲 (180)
浅析清孝陵幸免盗劫原因	庞玉忠 (185)
乾隆御制诗中的“爱物”思想	晏子友 (189)
论满洲巴克什在清朝开国史中的贡献	张丹卉 (197)
盛京将军设置考	张虹 (202)
清代宗室亲王的封谥	程大鲲 (206)
略述清初皇女“下嫁”	张汉杰 (218)
满汉文化融合与“档案”词源	王爱华 (227)
清初经筵日讲制度的确立及特点	张爱群 (232)

第二部分：文物研究

满族的玉器文化与清代的玉雕艺术成就	毓子重 (238)
论“馆阁体”对清代书法的影响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乾隆御笔”例说	王梦赓 (244)
关于清初年传教士进呈宫廷的两架天文仪器	
——兼谈需求与引进的关系	刘潞 (250)
明式家具产生的时代背景	胡德生 (259)
对沈阳故宫收藏的“蜀道岷峨小峨眉”大理石插屏赏析 ..	冯春江 (264)
戒得堂论	蒋秀丹 (267)
清代宫廷服饰的缘饰	冯秋雁 万征 (273)
清入关前的信警器及其在战争中的作用	王爱军 (278)
谈清初瓷器工艺影响朝鲜瓷器发展的点滴见解 ...	吕霁虹、李贤淑 (285)
沈阳故宫博物院院藏《王鉴仿宋元各家山水册》	
——兼谈王鉴	周维新 (291)
从玺印看清代皇帝的思想信仰	郭福祥 (297)
院藏善本书《皇清职贡图》	侯瑞秋 (304)
从几件院藏屏风谈清代屏风的装饰风格、功能和	
文化特征	李建华 (310)

第三部分：古建筑研究

论清前期皇宫建筑艺术风格和满族文化的发展趋势

- 支运亭 (316)
- 从《盛京城阙图》的发现及其价值看满文研究的必要性 ... 王佩环 (325)
- 关于沈阳故宫的 1663 年的满文文件 斯大理 (333)
- 盛京皇宫建筑文化认识 井晓光 (337)
- 清初喇嘛庙的建立和发展 张占生 (342)
- 园林文化拾趣
- 避暑山庄流杯亭与曲水泛杯 杨天在 王福山 (348)
- 盛京天坛考 周苏琴 (354)
- 《盛京城阙图》考略 朱淑媛 (359)
- 乾隆初期沈阳故宫修建考实 郭美兰 (364)
- 沈阳清代一宫两陵建筑柱石的类型特点与分期 ... 纪雅萍 周阳生 (373)
- 努尔哈赤与赫图阿拉霍通 李荣发 沈秀清 (381)
- 北京、沈阳故宫彩画异同论 王成民 (393)

第四部分：民俗宗教

- 中国满族民俗文化概述 姜相顺 (400)
- 清代锡伯族的文化特点及其与族源关系 郑川水 (409)
- 满族传统舞蹈的民族特点 李 德 (414)
- 满族信仰的嬗变 李克域 (420)
- 清代宫廷饮食中的满族特色 苑洪琪 (429)
- 故宫雨华阁藏传佛教神系与密宗四部思想研究 罗文华 (434)
- 从满文档案看三世章嘉呼图克图其人其事 张 玉 (441)
- 清皇家寺庙大威德金刚佛像造型
- 浅谈雪域牦牛图腾文化 李海涛 (448)
- 试论清初满族文化的演变和内涵在陵寝上的反映 徐广源 (454)
- 论努尔哈赤“血亲复仇”思想在其统一、建国
- 战争中的作用 李 理 (461)

努尔哈赤崇天信天及其影响	陆海英 (468)
从九王坟看多尔衮的荣与衰	尚洪英 (474)
浅谈清朝习武习俗的兴盛与衰退	那凤英 (479)
浅谈清皇室殉葬习俗	马利红 (483)
试述清帝由火葬向上葬的转变	邢宏伟 (486)

再释阿其那塞思黑 与满族传统文化

康熙(清圣祖玄烨)诸子中的第八子胤禩和第九子胤禵之改名为阿其那(Acina)与塞思黑(Sishe),自来世俗相传,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就是满语汉译“狗”和“猪”之义,而清史学界长期争论,说法不同,疑窦颇多,迄今尚未取得共识^①。我曾撰《释阿其那与塞思黑》一文,今旧题重提,这篇小文从清入关前满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分析它、探讨它,也许不无一点可供参考之处。欣逢举办纪念沈阳故宫博物院建院七十周年庆典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之际,承蒙见邀,无以为贺,爰将小文重加修订,敢以为祝嘏之什,并就教于当今海内外著名之专家学者,不吝赐正。

一、改名几种不同字义

阿其那(Acina),其满语 Acimbi,汉译为驼^②,负荷之义,名动词;或作驮^③,动词;语根 aci-加趋向形态-na 意为去驮,Acina 即为 Acinambi 一字省去语尾-mbi 之简写。或谓雍正(清世宗胤禛,康熙第四子)“命其弟胤禩为阿其那,义为去驮着他的罪行吧。另有一说,认为阿其那系口语,系在赶狗的意思。这里将允禩比作讨厌的狗,轰出门去”^④。后面再详。

塞思黑(Sishe),满语,汉语为褥^⑤,或褥子^⑥名词;两者文白有别,而其义一也。又满语塞思黑之汉字音译一作“西斯精”^⑦,则义同音稍异耳。

二、改名是自改或他改?

胤禩与胤禵之改名为阿其那与塞思黑,历来清史学界均认为是出于雍正之命,亦即出于雍正之口,几乎成为定案。

今据《清世宗实录》载:“雍正四年[1626]三月丙申,先是,宗人府奏:‘允禩、允禵……等既已削去宗籍,应将伊等本身及子孙俱撤去黄带,更改旧名,归并各该旗各佐领。’……奉旨:允行。至是,正蓝旗都统音德等将允禩、允禵等更名编入佐领事,定义奏闻。得旨:‘尔等乘便行文楚宗,将允禩之名并伊子孙之名,著伊自身书写,告知楚宗,

令楚宗报于尔旗。允禔之名及允禔之子之名，亦著允禔自身书写，编入佐领’”⁸。

《宪录》同年同月甲辰又云：“诸王大臣等遵旨将允禔改名之处询问允禔，允禔自身改名为阿其那，改伊子弘旺名为菩萨保。奏入，报闻。”⁹

据此，知胤禔之改名阿其那，系胤禔本人自改。与胤禔之改名塞思黑为他改则有所不同。

《宪录》载雍正四年五月乙巳：“诸王大臣等参允禔改名，所拟字样，存心奸巧，殊属不法，应发令拟改。得旨：‘……允禔改名之事，诸王大臣议令发令自改；著发令自改，伊必至又多奸诈。著交与诚亲王〔胤祉〕、恒亲王〔胤祺〕酌改具奏。’寻议：允禔应改为塞思黑。从之”¹⁰。

据上所述，知胤禔原先自身所改之满名为何，未见记载，已不得而知，则塞思黑一名实由雍正命弟胤祉、胤祺辈所改，为他改，显然与胤禔之自改不同。

三、改名狗猪之忌讳问题

昔年我国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曾谓：“胤禔、胤禔之改名阿其那、塞思黑，世俗以为满洲语‘猪’、‘狗’之义，其说至为不根。无论阿其那、塞思黑非满文‘猪’、‘狗’之音译，且世宗亦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¹¹。陈先生指出改名“决无以‘猪’、‘狗’名其同父之人之理”，确为不易之论。证之稍后的雍正上谕，有云：“雍正四年六月初三日上谕：皇上〔雍正〕令其〔阿其那〕设誓，阿其那含刀发誓云：‘我若再与塞思黑往来，一家俱死！’‘一家’二字是何等语？皇上〔雍正〕以‘一家’二字推之，可涉及圣躬〔雍正〕。随经降旨戒飭”¹²。从而不难推知，“一家”二字既涉及父子兄弟，那么“猪”、“狗”二字岂不同样包括父子兄弟在内吗？父子之恩，此而不可乱用，同样，兄弟之亲，彼亦自不可轻易涉及，这岂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此则汉族历代封建王朝自来以忠孝伦理道德标榜，自是千古相传之至理；即满族统治者君临中原亦将及百年，崇尚孔孟，提倡程朱，一切唯君父之命是从，岂不亦与汉族封建思想体系已殊途而同归耶？

四、满汉命名的传统习俗

稽诸满族传统文化的口头习俗，早在女真人建立的金代王朝（1114—1204）期间，女真人就有用“狗”和“猪”字眼的骂人语，但人们并不认为这就涉及父子兄弟的血亲关系。兹举《金史·乌春传》中的一段话为例：

“世祖〔劄里钵，女真人〕使〔乌春，亦女真人〕与〔跋黑，胡里改人〕约婚。乌春不欲，笑曰：‘狗彘之子同处，岂能生育？’胡里改与女真岂可为亲也？”¹³这里是把胡里改比作“狗彘之子”，很显然含有蔑视、污辱之意，而又牵涉到乌春自己与之“同处”在内，似乎是当时惯用的骂人口头语而并不引以为涉及人身污辱者也。

其实，在汉族文化的传统习俗中，同样亦有这类情况。在祖国统一的多民族大家庭的文化经济交流中，相互学习，相互吸收，谁先谁后，谁影响谁，是很难搞得一清二楚的。从历史文献资料看，《史记·司马相如传》就有“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¹⁴，“犬子”是司马相如的小字（乳名），而且是他父母给他取的小名。以后历代

相传，人们谦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或“小犬”，一般平民老百姓亦有父母替儿子取名叫“狗儿”或“狗仔”或“牛儿”或“牛仔”的。又如《北史·张元传》亦有“村陌有狗子为人所弃者”^⑪。按“狗子”即“狗儿”、“狗仔”，与犬子同义，这里的“狗子”亦是骂人语耳。

另一方面，古人亦有以猪与狗同作骂人语者，如《三国志·吴主传二》注引《吴历》有云：“曹公〔操〕见〔吴孙权〕军伍整肃，喟然叹曰：‘生子当如孙仲谋〔权〕，刘景升〔表〕诸子若豚犬耳！’”^⑫同样，历代汉人父母亦有以豚儿与犬子给儿子取名的。如《通俗编·伦常》亦有“豚儿犬子”一条，“轻贱之辞也”^⑬。《资治通鉴》后梁太祖开平二年（908年）记载：“帝〔朱温〕叹曰：‘生子当如李亚子〔李存勖〕，〔李〕克用为不亡矣！至如吾儿，豚犬耳！’”^⑭很显然，这固然是父母自称其子之谦词，自然也没有一点包含涉及自己血缘的亲属关系在内之意。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满族同汉族一样，在一般情况下，父母叫自己的儿子为豚犬或狗彘是自谦之词，不是骂人语；甚至男儿小时候的小名叫犬子或豚儿的，则是父母希望自己的儿子卑贱如犬豕，便于教养成人之意。至于胤禩与胤禪之改名为“阿其那”与“塞思黑”虽一出自改，一出他改，有所不同，但不管怎样，与满语“狗”和“猪”的译音，表面上似乎并无任何联系，但无论如何，他们二人的改名都有被蔑视、轻贱之意，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五、满族口语与传统文化

陈寅恪先生又云：“尝闻光绪朝盛伯熙祭酒显语文芸阁廷式以塞思黑之义为‘提桶柄’，然‘提桶柄’亦难索解。寅恪偶检《清文鉴·器具门》见有满洲语‘腰子筐’一词，若缀以系属语尾‘衣’字（原注：如包衣之衣，满洲语包为家，衣为的。）则适与塞思黑之音符合。证以《东华录》所载世宗斥‘塞思黑痴肥臃肿，弟兄辈戏笑轻贱’之语（原注：见《东华录》雍正四年五月十七日戊申条），岂其改名取像于形状之陋劣，而‘提桶柄’之说乃祭酒〔文廷式〕之语，传者记忆有所未确耶？”^⑮按《东华录》原文为“至塞思黑乃系痴肥臃肿，矫揉造作、粗率狂谬、下贱无耻之人，皇考〔康熙〕从前不比之于人数，弟兄亦将伊戏谑轻贱”^⑯。我们已经知道塞思黑之改名非出自改，乃为胤祉、胤祺辈所改，或者祉、祺辈本于雍正斥胤禪之语来改，亦未可知。如果依陈先生所说，把胤禪体形“痴肥臃肿”解释为“肥胖讨厌的东西”，再照雍正所说康熙“从前不比之于人数”的话引申一下，“塞思黑”一词岂不就成了“猪”吗！

据满语专家玉麟先生（锡伯族）的考查，认为阿其那与塞思黑“这两个词来源于满族的群众口语，是满族在过去农牧游猎生活时习用的词，以后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逐渐不那么使用了，但是使用满语的一些老年人，有时还使用这个词‘阿其那’满文 Aqian，……词根是‘阿其’，又说‘爱其’，去、走的意思，加尾音‘那’。阿其那就含有对对象讨厌和轻视的去吧、走吧的意思，如果对谁加重语气地说‘阿其那’，就含有把他像狗似的赶走的意思。……所以雍正帝把胤禪改名为‘阿其那’就是把他比作狗，像厌恶狗似的赶出去的意思”^⑰。

玉麟先生又说：“‘塞思黑’满文 Seche 是从满语词根 Sechemi 猪刺伤人的意思变来的。……后来演化到民间的语言中，就把一个人用恶语伤人比作野公猪用其长牙伤人，说他是‘苏达塞思黑’总是刺伤人”²²。

从玉麟先生对阿其那与塞思黑二字的词根及其引申之义而得出二字为狗、猪的意思，特别是对阿其那一词的引申诠释是很有语言学根据的，也很有说服力。但从历史事实来考虑的话，不但阿其那与塞思黑二名均非出之雍正之口，阿其那是胤禩自改与塞思黑为胤祉、祺辈所改，而均为雍正所认可；要真含有狗、猪之义，像前面所提到的，雍正连胤禩所说“一家”二字都不许可，不可想象怎么敢让禩、禔自比狗、猪，或让其弟祉、祺把他们自己同父的两个弟弟比作狗、猪的！这又怎么解释呢？

六、小 结

钟翰按：雍正既然亲口指出胤禩说过“一家二字可涉及圣躬 [雍正]”的话，而为雍正所斥责，好像一牵涉到父子兄弟的血亲关系的话语，就是大逆不道，绝不允许似的；可是就在差不多同时康熙为什么自己亲口说出“且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的话来呢？查原话在《宪录》里是这样记载的：“雍正四年六月初三和硕康亲王崇安等公同谨奏，……是日 [康熙五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圣祖仁皇帝又降旨：‘……只得将不可册立之允禔放出。……允禔谓朕 [康熙自称] 年已老迈，岁月无多，及至不讳，伊 [指胤禩] 曾为众人所保，谁敢争执？遂自谓可保无虞矣。且恐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仰赖其恩，为之兴兵构乱，逼朕 [康熙] 逊位而立允禔者’”²³。再查《上谕八旗》里同年同月同日的康熙谕旨中汉文有：“后日必有行同狗彘之阿哥”一句，满文作“amavgi inenggi agesei dorgi, urunaku indahun [狗] ulgiyan [彘、猪] i adali yabume”²⁴，而汉文《上谕八旗》与《实录》全同²⁵。是康熙自己亲口说出的以狗 (indahun) 和彘 (ulgiyan 猪) 斥其诸子矣。康熙既可以斥其诸子 (阿哥) 为“行同狗彘”，则雍正之命胤禩、胤禔改名为阿其那 (狗) 和塞思黑 (彘) 又有何不可？

不过“行同狗彘”的话与把阿其那、塞思黑二字引申之意为狗、彘，究竟是有很大的区别，不能等同起来混为一谈。而自来世俗相传阿其那为狗、塞思黑为猪的说法能否一概加以否定吗？陈寅恪先生和玉麟先生对阿其那 (轰狗的形声字) 与塞思黑 (取像于体形字) 两个字义的诠释，久而久之，一传再传，人们自然而然地从本字原义不是狗猪的音译，引申而为狗猪之义，也是无可厚非的了。不过，我个人认为，清入关前满族传统文化的习俗口语仍然世代相沿，即使在深受中原汉族封建伦理教化的近百年的熏陶，而到入关后仍然保留一些过去不堪入耳的骂人语，从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和顽强性看，是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满族是如此，汉族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注释

① 肖一山著：《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出版，1962年)卷上，第862页：“阿其那，满语狗也；……塞思黑，满语猪也”云云。富丽撰：《阿其那塞思黑新解》，刊于《文史》(北京中华书局出版，1980年)第十期，第220页，不同此说。